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员著述系列

明史学步文选

南炳文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明史学步文选

南炳文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史学步文选 / 南炳文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4. 10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ISBN 978-7-5528-0272-6

I. ①明… II. ①南…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文集
IV. ①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9387号

明史学步文选

南炳文/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66 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272-6

定价: 42.00元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刘志永

副主编：陈 雍（常务） 马 竞 南炳文 王宝贵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竞 王宝贵 王振德 刘志永

阮克敏 张春生 张铁良 陈 雍

罗澍伟 南炳文 钱 钢 崔 锦

韩嘉祥 甄光俊

自序

1996年我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明清史蠡测》。2006年自选了第二本论文集《明史新探》，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2006年以前十年间撰写的论文。2010年自选了第三本论文集《明清考史录》，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010年前五年间撰写的论文。这一本论文集是我自选的第四本论文集，其缘起乃承蒙刘志永书记、陈雍馆长、温洁处长等贯彻市委、市政府领导关心文史馆馆员著述发表的好意，代表文史馆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多次督促我搞一本新的论文选集，使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而从命完成其事。按照出版馆员个人著作的有关约定，此类文集所收论文应从其人全部学术论文中选出。由此，这本论文集除了收入我近四年所撰写的几篇论文外，其余皆选自前三本论文集之中，共二十五篇。从内容划分，这二十五篇论文涉及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献、中外关系及旧方志、天津地方史等，除两三篇所论内容越出明代范围外，其余全部属于讨论明代历史者。我自1962年起决定学习、研究明清史，而其中尤以明史为重点。这本论文集所收文章的挑选，本来无意只选有关明代历史者，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如此，其实正反映了我治学的成长历程。文章选定命名时，由此而自然地题成了“明史学步文选”，目的在于反映在学术上蹒跚学步的实际情形，以便读者掌握全貌，从而能根据我的具体情形给予切实的指

导。我诚恳地祈望各位读者，畅所欲言，惠予指正，帮扶我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为前三本论文集写自序或后记时，我总忘不了感谢使我学有所得的母校、老师、亲朋等。这次写自序，也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指导，我不会有今天，而出论文集之事更是梦中也不可能想及的。然而在写这本论文集的自序时，除了感谢母校、老师、亲朋外，还要特别对学校之外有关的机构和友人表示真诚的谢意。比如 1979 年始，我加入了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直至 1995 年因年龄过大而退出，前后在其中十七年。1993 年始，我加入了天津市政协，直至 2013 年因年龄过大而离开，前后在其中二十年。2010 年始，我光荣地成为天津市政府文史馆馆员，到今年已近四年。无论是天津市青年联合会，还是天津市政协、天津市政府文史馆，都使我接触到许多领域的有高深素养的众多专家，从而耳濡目染，广开眼界，增长了宝贵的多方面的学问，也使我走出高校的象牙塔，耳听目见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从而学到深刻而实际的活知识、真知识，使书本上得来的理论在脑海中变得真切起来、扎下了根，并使作为历史研究者的我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对复杂现象的观察深入了许多，关键所在之发现容易了许多，写出的文章渐渐抛弃了八股气，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日渐提高。言念及此，在我撰写这本反映本人学术上逐步前进历程的论文集的自序时，怎能不向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天津市政协和天津市政府文史馆表示由衷的感谢呢！特别是天津市政府文史馆，乃这本论文集出版的支持者，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我更不能不在这篇自序中，向天津市政府文史馆致以真挚的谢意。

在这里，还要向天津古籍出版社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我在

天津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过《清代文化》、《明史研究备览》、《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古典目录学研究》、《辑校万历起居注》、《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等多种图书。在我学术上逐步成长的过程中，始终有天津古籍出版社各位领导和编辑的大力帮助。现在，我要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于南开大学文科楼

目录

自序 001

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 001

海瑞之廉洁反贪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 009

论张居正大力裁革冗官及其失败的教训 039

明代寺观经济初探 066

明代两畿鲁豫的民养官马制度 086

明代的苑监官牧 122

明代的不良牙人及其防范 139

明代经济领域诬骗窃夺现象的盛行及其防范 155

明初军制初探 170

中国古代的鸟枪与日本 230

明代文化特色浅论 245

消极与积极并存：明朝建国前后祭祀活动述论 253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 305

关于燕王朱棣的两篇敕书造假案献疑 315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太祖、太宗两朝实录的版本价值 334

《辑校万历起居注》自序 351

《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 366

明代的贡献及其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371

明太祖对待南海周边诸国政策初探 391

关于15—16 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

——纪念郑和远航开始 600 周年 405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中的策彦周良与淮安 419

旧方志风俗志漫笔 429

名胜古迹文字资料搜辑整理刍议 440

解开天津右卫创建史上的两个谜团 452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466

附录：论文著作编年 474

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

包括南明在内，明朝的寿命几近三百年。这在我国古代史上，是属于国祚较长的。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交往诸方面，都有显赫的成就，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择其要者，略述数端。

古语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里的“天”，如果按照唯物论者的解释，把它作为客观规律的代称，那么这句古语就是从宏观的角度道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管是什么人，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才能在历史上发挥进步作用。这个真理，在中外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得到证明；而明朝的历史，尤其清楚地向人们作了证明。就以朱元璋的历史活动为例。从总体上讲，朱元璋无疑是一个获得极大成功的人物，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他在群雄并起的元朝末年，既削平了群雄，又推翻了元朝，在中国大地上重建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政权。他为什么能够建立这一历史性的功绩？显然是由于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元朝末年，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的黑暗统治，造成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局面，群雄之所以一时并起，根源即在于此。而要解决这时的混乱状态，就只有在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两种矛盾之后，才能奏效，这也就成了当时强烈的时代要求。通观这时的元朝政权和朱元璋以外的各地群雄，都没有能

够提出符合这一时代要求的政策，而只有朱元璋这样办了。他起兵不久就支持农民反抗地主夺取土地的斗争，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在北伐中原、向设在大都（今北京）的元朝中央政权作最后冲击时，他又发布告北方人民的檄文，号召汉族各阶层人民“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对蒙古、色目人则宣布“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对解决当时的民族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①。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战胜元政权，其奥秘就在这里。

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为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订立了完备的法规与章程。但是，这些法规与章程，在其各个继任者中执行情况并不相同。这就牵涉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人治好，还是法治好？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看来，只有好的章程、法规，而没有一个善于执行这些章程、法规，或者德才兼备、善于因时制宜地对国家加以管理、在国民中享有极大威信的当权人物，是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反过来，只有一个理想的当权人物，而没有相应的比较健全的章程、法规，同样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明朝的历史对此作出了生动的说明。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进一步发展了在中国古代史上早已形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制度在对付人民群众方面的功能，诚然是不足称道的，但它将统治阶级的权力尽可能地集中在皇帝手中，削弱了文官武将、地方势力的力量，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任何臣民都无力与皇帝对抗，因此也较好地担负起了防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叛乱、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从这一角度讲，它是值得肯定的好章程。不过，当时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只有在皇帝

^① 《明太祖实录》卷21，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是比较有作为的当权者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挥，否则就起不了作用。比如，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倦勤怠政，使得宦官权势大大发展，出现了汪直等有名的权势显赫的大宦官，时有“今人但知汪太监”之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的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功能，被大大降低。再如天启年间，由于明熹宗非常昏庸，大权旁落于著名宦官魏忠贤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功能，再一次被大大削弱。而嘉靖年间，情况与上述两个时期截然相反，皇帝朱厚熜接受了前辈的教训，在宦官问题上头脑甚为清醒，对之控制甚严，犯罪者“杖之至死，或陈尸示戒”^①，从而使得这时的宦官皆小心谨慎，不敢越权行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的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功能，因之没有受到宦官的影响。以上各例，虽然仅限于宦官势力消长一个领域，但在说明为了要把国家治理好，好的章程与好的当权者必须同时具备上，却是十分有力的。

回顾明朝的兴衰史，还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其中期的改革运动，对于延长明朝的寿命，起了很大作用。土木之变后，经过八十余年发展演变的明王朝，已经进入中期阶段。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土地集中的现象日益严重，人民的赋役负担越来越大，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与日俱增，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境外势力的威胁也在迅速增长。到了正德年间，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南北各地，嘉靖年间更出现了“南倭北虏”交相为患的局面。时至于此，如果没有相应的挽救措施，明朝政权的覆灭指日可待。但是，自嘉靖中期之后，明朝统治集团中出现了海瑞、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有远见、有头脑的政治家，他们先后搞起了以

^① 《明史》卷304《宦官传》一。

整顿赋役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中心的，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诸多方面的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当时的阶级关系，清除或抑制了若干腐朽的社会现象，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改善了封建国家的财政状况，增强了国力。这一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尽管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的没落命运，但确实为这一险象丛生的封建王朝注入了一些活力，使之避免了迅速灭亡的命运。如果从张居正去世这一全国性的改革基本停止的万历十年算起，明朝中央政权此后继续存在的时间还有六十二年之久；如果从嘉靖中期算起，明朝中央政权此后继续存在的时间则达到了约一个世纪。明中期改革运动延长明王朝寿命的事实，对于后人很有借鉴意义。一个政权，当它刚刚建立之时，除个别情况外，一定是生气勃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必然逐渐面临日益严重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对这种局面，如果当权者昏暗不堪，墨守成规，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一步步陷入灭顶之灾，政权遭到覆亡的命运。如果不想遭到这样的下场，那就只好向明朝中期的张居正等人学习。其实，这样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说是相当之多，不过，明朝的情况十分典型罢了。

官吏是否廉洁，对于政权的兴亡往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回顾明朝的兴衰史时得到的又一个极为深刻的感受。在封建社会里，官吏贪污受贿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痼疾，最好的情况是受到抑制，贪污受贿现象不过分猖狂。但即使这样，对于社会安定发展也有明显的作用。明初朱元璋时期就是这样。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极力抑制贪污，为此不惜采用剥皮实草之类酷刑。朱元璋的这类举措，对于改变元末贪官污吏恣意横行的局面，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当时虽然贪婪的赃吏仍不乏其人，而对老百姓“招徕拊循”的循吏也为数不少，这一时期成为封建社会里吏治相对清廉

的时期。众所周知，朱元璋当政的明初三十余年，是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的“清明”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究其原因，官吏贪污受到抑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明朝末年的情况与朱元璋当政时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明中期以后，政治渐趋腐败，贪污受贿的现象日渐抬头，当时兴起的改革运动虽然曾经将抑制贪污列为改革的内容之一，但并未能把这一问题较好地解决掉。到了明朝末年，吏治空前败坏，甚至由于贪风太盛导致无钱即不能办事，从而使得个别官吏想独自成为清廉君子也办不到。当时贪污最厉害、影响最大的是军官。军官的营私中饱，使得明王朝筹措来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后金的军费大都落入他们的私囊。为了解决问题，应付时局的需要，明王朝只好再次筹措，但接踵而来的是军官的再次干没。于是便形成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这一次次的恶性循环中，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随之而一次次加重。这时所谓的“三饷”加派，便是由此而产生的。说到明朝灭亡的原因，谁都知道赋役剥削的极端沉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由上述情况来看，追根究底来讲，则不能不将之归结在吏治的败坏、贪风的盛行上。综观明初和明末的情况，一个发人深省的规律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面前：官吏廉，国可兴；文武贪，国必亡。这一血的教训，后人实应牢牢记取。

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当时，江南地区的丝织业等行业中，存在着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甚至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了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的离经叛道思想，强调“人必有私”的观念，以及提倡“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等。大约在同时，西欧自地中海沿岸开始，也陆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快发展起来，在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又出现了工业革命，从而进

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中国却是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时，中国发生的是旧式的农民战争。到了18世纪，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以明清之际战乱后的残余为基础，重新进入恢复期，但始终没有壮大起来。19世纪中叶后，中国的社会更因外力入侵而中断了正常发展，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为什么中国与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两种不同的命运呢？回顾明朝的历史以及同期的西欧史可知，刚刚出世的资本主义萌芽力量十分弱小，单靠自己是不能茁壮成长的，它需要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才能战胜封建势力，壮大自己，并最终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这种支持，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得到了，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没能得到，相反还受到了种种压制和摧残，如在明代的中国受到了重征迭税的剥夺和矿监税吏的肆虐。可见，中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之遇到两种不同的命运，实非偶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担当国家重任的后来人，当新的先进的社会因素出现时，千万不可忘记爱之、扶之，否则将酿成大错，成为历史的罪人。

中华民族是由多个兄弟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之间优势互补，相依而存，在互相学习、帮助中共同为中国的文明发达做出贡献。各个民族之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难免偶尔产生矛盾，甚至发展至冲突和战争，而冲突和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皆受损害，这从反面教育了双方，最终会捐弃前嫌，重归于好。因而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相互间友好相处、亲密交往是常态，矛盾冲突是偶或存在的变态，而且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相互间避免冲突、友好相处的重要，相互间的关系呈日益密切的总趋势。回顾明朝的历史，对于这一点，可以十分清楚地观察出来。如当时的蒙汉关系即是如此。由于明朝是在

推翻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退到漠北的蒙古贵族又不甘心这一失败，因而自明初以来明朝与蒙古贵族之间发生了不少武装冲突。但尽管如此，蒙古族与内地汉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在有明一代一直未断。并且因双方为了应付武装冲突，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仅从修筑万里长城一项，就可以想象出明朝为此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至于蒙古方面则“分番夜守”、日防明兵之“赶马捣巢”、“未遂安生”等记载，史不绝书），导致“华夷交困”，终于使明、蒙双方决定弃战言好，从而出现了隆庆年间的“俺答封贡”。自此，明朝解除了北方的边患，大省军费；蒙古则得到了在沿边开设互市市场的好处，使之可以很方便地以畜产品换回内地的布匹、铁锅等生活必需品。由此，蒙古族和汉族的亲密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明代及历史上各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相互关系日益亲密的总趋势及其形成原因，为后人正确处理这类关系、努力发展平等和睦互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明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以至非洲、欧洲国家，发生了广泛的关系，这一段中外交往史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很深刻的。有明一代，倭寇曾猖狂骚扰东南沿海，来自西方的葡萄牙、荷兰等国殖民主义者也先后来中国进行侵略，他们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危害，但最终都被中国军民打败了：倭患被平定，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从浙、闽沿海等地被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台湾向郑成功递交了投降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是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但是，在抵抗外国侵略中仅有英勇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否则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明朝时期，中国无论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文化发达程度，抑或是国家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实力，都处于世界的先进之列，综合国力不弱于任何外来的入侵者，这才保证了军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最终胜利。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要自立于世界，保持独立地位，必须千方百计加强自己的综合国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明朝后期，西方耶稣会士随着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也来到了中国。他们的本意在于向中国传布天主教，但为了取得中国人的好感和信任以便传教，很注重向中国介绍欧洲的科学知识，其中有一些是先进于中国的。当时一些勇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等，也积极与西方耶稣会士相交往，接受其介绍的先进知识，从而形成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这对当时中国数学、天文学、历法、物理学、军火制造等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徐光启等勇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举动，反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而其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给中国所带来的益处，启示着后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不断进步，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诚为十分必要。